

ISSN: 1990-9020

田野與文獻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田野考察筆記

大都市中的鄉村印跡——廣州石溪村考察記

• 黃學濤 劉正剛

會議報告

戰爭、日常生活和近代中國——「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 黎志剛 袁子賢 楊彥哲

香港歷史的教與學

香港新界上水廖氏春祭考察報告

• 鄭澄 梁浩宜 蔡俊傑

活動消息

75 第75期
2014年4月15日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七十五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3588939 傳真：(852) 31758145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大都市中的鄉村印跡——廣州石溪村考察記

黃學濤 劉正剛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近年來，我們常在廣州市區內的城中村進行田野考察，試圖找尋傳統鄉村社會在城市化過程中消失前的歷史印跡。2014年6月12日，我們一行數人走進廣州市天河區東圃鎮的石溪村進行考察。石溪村今屬前進行政村管理，與其毗鄰的有宦溪、蓮溪等自然村。據說，北宋時石溪村已有居民，時稱石子粟村。南宋時，石溪秦氏開基祖秦悅會攜帶子侄從南雄珠璣巷遷入定居，因秦悅會別號石溪，故以其號名村。石溪村北面與宦溪村相連，南與珠江相鄰，村內河涌較多，以石溪涌，牛佛涌較大。石溪村以秦、劉、凌等姓為主。我們主要考察了祠堂、古廟，並在訪談中從村中幾個大姓人家獲得了族譜資料。

一、從石溪村族譜看村史

石溪村的歷史，與秦、凌、劉三姓密切相關。瞭解三姓的來歷及發展即可知道石溪村的發展史。我們進入村口，就遇到了秦大爺，他告訴我們石溪村的命名始於他的先祖秦悅會，並拿出1998年重修的《石溪秦氏族譜》，族譜中收錄了一篇撰寫於洪武年間的舊序，引述如下：

〈番禺石溪秦氏老族譜序〉

秦氏之世其來舊矣！先世系出金陵常州府無錫縣，乃舊京閥閱名家也。始祖憲公生二子，長曰會，次曰嘉。宋季時，會祖除南雄府尹別駕，後居保昌縣紅梅驛沙水鄉珠璣巷。時因國子監助教嘉祖承命至廣州，征崔與之公入參政事。奈值襄陽之變，停驂於廣。會祖輒有連枝之想，即率子侄入廣，路過寶安，至靖康場爰居焉。別號石溪，配安人姚氏，生四子：長仕清，次仕濂，三

仕豪，又名仕澄，四仕潔。清等奉公葬於白石馬山，作子癸向之原，奉安人姚氏葬於沙頭飛鵝嶺，作艮寅向之原。清世守箕裘，濂竊思瀕海，遷居番禺，澄遷香山，潔遷新會，今承憲公為始祖，石溪公為一世祖。清、濂、澄、潔為二世祖。蓋從其擇於斯，居於斯，千萬年之枝葉亦基於斯也。至於嘉祖子孫，世傳居住東莞，濂離背即其苗裔云，迄今嗣胤繩繩，家聲奕奕。木本水源之念，其胡敢忘？賢子肖孫祀春祀秋，宜感歲時以興思，為祠為墓，當緣世代以更新。思之者報本追遠之志，新之者尊祖敬宗之義。謹述序之之由，以望後世修之。至於嘉祖支派不能代為諱述，而世傳莞邑濂離背即其苗裔，以清、濂等子孫亦常常敦篤宗誼，往來無間，是猶吾會祖連枝之意云。

大明洪武十四年辛酉歲春三月吉旦
四世孫觀福等手錄

這篇寫於洪武十四年（1381）的譜序，是秦悅會四世孫秦觀福抄錄，從中可知，石溪村命名是因南宋末秦悅會南下廣州，因其號石溪，故後世子孫稱該村為石溪村。秦悅會本為秦憲公長子，本名會，有一弟名嘉。秦悅會曾擔任南雄府尹別駕，居保昌縣紅梅驛沙水鄉珠璣巷，而秦嘉在廣州任職，後來因為襄陽之變，秦會率子侄入廣州定居。自此，秦氏在廣東分兩支，一支為秦嘉後代居東莞，一支為秦會後代世居番禺。秦大爺告訴我們，秦氏在廣東的太公、太婆分別葬在廣州和東莞兩地。

石溪村一世祖本名秦會，即譜中所說的「長

曰會，次曰嘉」，後人卻誤為秦悅會。這一改變大約在清代，據嘉慶丙子年（1816）秦氏二十世孫秦榮珍等為秦會立墓碑的碑文說「宋二世祖考悅會秦公、湛氏安人合墓」，光緒二十八年（1902）《仕清秦公祠重建碑》也寫作秦悅會。

秦氏從南宋末到今天，一直在石溪村定居，我們從《石溪秦氏族譜譜系圖》可得到印象，該《譜系圖》主要包括三部份，一是〈嶺南秦氏源流世系〉從北宋太師祖承議公講起，包括秦氏第九世秦憲公，一直到明朝第十四世秦氏子孫，並在世系圖後面附上了秦氏分佈地。二是良洞始祖世系圖，始於一世祖秦公一，其為秦氏在嶺南的十二世。三是石溪秦憲公直至今，共二十四世。

良洞秦氏應指明清時期位於新興縣的良洞秦氏房，從該譜序中的記載來看，良洞秦氏與石溪秦氏源於同一祖先，即秦憲公。至於何時遷到新興縣則沒有明說。

清光緒年間，石溪村開始由農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發展，秦明綱成為石溪的著名大商人，成為廣州首富之一。今修《石溪秦氏族譜·支持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事蹟》記載說：

秦明綱，字貴登，號祥光。係宋二世祖悅會公之四子仕傑公之後，第十九世傳孫。生於清同治（1868），清光緒十八年任五品同知官位。從事商界，人稱「merchant登」，在廣州舊豆欄開辦祥經和絲綢莊，又在順德大良、容奇、桂州開辦絲廠，半機械化紡絲，並在廣州沙面開設時昌洋行，與洋人做絲綢出口商務，代理南番順絲商辦理出口生意，遠銷歐美。光緒年間，在祖籍番禺石溪村興建光成秦公祠及花廳、綠筠溪館（書館），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圍庭建築。為拓展生意來往，疏通了石溪村環村河涌。……在村南珠江河邊興建牛牯石碼頭，再修築一條用花崗石鋪設的大道直通到石溪村。當時省城富商及洋人常有來往，電船也可從珠江河直駛入石溪村橋頭官邸。……當時在省城被

選為七十二行之首。至1911年孫中山反清辛亥革命，據傳受孫中山托任財政部長，手執「粵軍政府募捐軍費鈐記」大印（該印章及文檔資料一直保存至「四清」時，被黃埔公社派出所四清工作隊搜去）。祖公四處奔走，聯絡省港富商募捐籌款，支助孫中山革命活動，並支持在廣東建立了中華革命模範軍。……由於祖公一生施仁濟世，捐助公益，其美名一直流傳至今。

石溪第二十二世傳孫明綱公之嫡曾孫秦宇雄編錄。

秦明綱的事蹟說明，到了光緒年間，石溪村秦氏已經成為當地的大商人。隨着經濟發展，秦明綱等又發起修建村內的公路、碼頭等公共設施，石溪涌也得到疏通，也就是說，石溪村已經從傳統農業向城市化邁進。

如果說石溪秦氏在石溪村的定居史還不能全面反映石溪村發展史的話，那麼凌氏、劉氏的家族史則能讓我們對石溪村有更清晰的認識。

凌氏族譜是我們在訪談時在現居石溪的凌老大爺家中看到，譜名《宦溪凌氏族譜》。老大爺說，凌氏最初住宦溪村，與石溪村毗鄰，大概在明初七世祖凌子初遷徙到石溪村，凌氏主要集中在宦溪村，在石溪村沒有凌氏祠堂。《宦溪凌氏族譜》為影印本，族譜封面有「衍新堂」三字。從譜序看，《宦溪凌氏族譜》最早編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今重修3次，分別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光緒三十四年（1908），最後一次是2002年。族譜前半部份有序、碑記、墓誌銘、家訓、祝文等，後為世代圖，記載一至二十五代的衍生過程。據乾隆二十六年凌魚西等撰〈宦溪族譜序〉云：「吾凌系出姬文王之後衛康叔十三庶子，入周為凌人官，因官為氏，此得姓之始。世次靡得詳矣，其由吳而閩，開基莆田者，則自宋參知政事諱成公，由閩而粵蕃衍於廣州者，則自宋末制置使雷門公。」可見，廣州宦溪凌氏來自於福建莆田。有關制置使在《宦溪凌氏家譜》收錄有明代麗水人張敦仁撰《古制置使凌公神道碑》說：

公諱震，莆田人，參知政事，成八世孫，封武經大夫之塚子也。宋末任廣州都統，才兼文武，智妙經權。時值蒙古擾亂，乘輿播遷。元首逼帝由閩入廣。公集鄉兵起海上，圖復城，元師夔聞之退走，上下賴以稍安。祥興初，師夔再夷廣州。公克復之，遂升制置使，與張世傑等表裏，翊捍岡州駐蹕之所。後李恒搗城，戰失利，退於城東東圃，復糾義勇力戰，兵勢莫支，遂憤懣而歿焉。噫！生不受元宣慰之官，死不忘宋王室之難。公之才節，可與三忠並稱，垂百世不泯矣！娶妣七人，孕子十三。東圃宦溪其裔也，芟塘靈山其裔也，新會程村其裔也，芟塘金鼎其裔也，東圃村頭其裔也。餘或遷或沒，未盡紀焉。惟郭氏葬於古鼎崗，後殮公附葬於此，丁未向之原。十二傳以誠從甥宦游於麗水，思葺先塋，來請予志。謹稽廣志，敬述公績以揚之。銘曰：維公世系，出自參知，珠璣發跡，制值攸司。精忠貫日，勁節揚輝，成仁取義，舍公其誰？岩岩古鼎，宅兆丕基。凜凜英烈，百代瞻依。子孫千憶，享祀無期。

時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九月十二日
十傳孫敦、亨等百拜重修。

這塊碑文應該撰於隆慶三年（1569），張敦仁是明代山東按察副使，他是應制置使的後裔之邀而作。凌震後人在乾隆《番禺縣志》中記載凌震是福建莆田人，淳祐四年（1244）進士，廣東制置使，宋亡以後即留居番禺東圃一帶，先後娶妻7人，生13子，分別在東圃宦溪村、芟塘靈山、新會程村、芟塘金鼎、東圃村頭等地。凌震子孫為何分居呢？在族譜中《靈山寺碑記》有記載：

祖諱震，原福建興化府莆田人，宋授廣東大都統，才兼文武，心在王室。宋景炎元年，元首逼帝由閩次惠州，帝遣使奉表降元，我都統凌公與鎮孫起兵

興復宋帝，舟次梅蔚，二年海上七處駐蹕，三年元退師。二月宋帝舟次廣州，我祖與王道夫復廣州，詔以我祖為廣東制置使。五月改元祥興，六月帝幸崖山，十二月我祖在廣州與元將李恒戰，敗績，退於城東東圃，復糾義勇力戰，兵勢不支，憤懣而歿，殮葬於古鼎崗郭氏夫人墓，子孫散處。二世祖宣議方道公，行二，辟地靈山而家焉，三世祖提督賢甫公，建祠設立祭田，子孫致祭，歷經二百餘年。祖有旌褒之典，維持世教，家運中微，代乏哲人，不得表揚。十二世孫以誠，年躋九十有二，冠吾族長。因會議興工修整，核明祭田，謂不可無文以詔後世，乃立碑於祠右，按譜記實，思以垂不朽也。後進禮樂彬彬，其有興乎。

萬曆十三年乙酉十二月建 明十一
傳以誠本信號荔亭

宋末元初，凌氏主要居住在東圃、靈山一帶。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廣東各地的凌氏開始以凌震的名義，在省城廣州建制置使公祠，族譜收錄了康熙四十五年（1706）《合建省城長塘街制置公祠引》：

吾祖制置公自閩至粵為海州都統，再任廣東制置使。後值元亂，遂家東圃而居焉。嗣子十有三人，至孫而誦誦繩繩，森蔚益增，人眾居分，漸散於各府州縣者不可勝數，而愈傳愈遠，多有不知根源何自者。幸而宦溪、靈山、金鼎、程村、潭村數鄉，雖世數已遠，尚人人記有制置公在胸臆間，春秋報祀，未嘗或缺，但各祭於其本鄉之祠，而省會環眾未有，特主以制置為開粵始祖，豐功盛烈，百世共賴，而特祀無地，子孫歡心，未及合展，殊為缺然。且今別姓屬遠為近，聯疎為親，省中建祠者甚多，況吾姓數房，一脈至親，益當同

建，以妥先靈。今各房會議，思在羊城買舊轉新為開粵祖祠，此中費用，須各房努力，方能有濟。今特設簿，希各房共認銀兩，房內有力者宜另標題，至匯銀之日，須擇清心直行、一塵不染者，相為主持，庶謀事周詳，措置得宜，上可報數百載之功德，下可裕千萬冀之仁孝，是舉也。想人心同然，特前此未有以發之耳，今聞此說，凡為制置公子孫者，諒無不踴躍歡欣，盡心竭力，以襄其成。我今同志略為數言，以引其端。

時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長冬首事文相眾興於經齋光士英、宗賢、濟珍、湘攀等仝啟。

從此祠引來看，康熙四十五年凌氏子孫分佈於宦溪、靈山、金鼎、程村、潭村等地。相較於明萬曆年間，有凌氏族人遷徙到潭村居住，各房分居祭祖，各有祠堂的情況。到了清初，凌氏受到廣東一些氏族流行在省會廣州建合族祠的影響，遂各房商議在省城建制置公祠，以凝聚各地族人。到了乾隆初年，宦溪、坦頭、石溪等的凌氏又在宦溪建大宗祠，乾隆六年（1741）《宦溪大宗祠碑記》對此記載說：

吾族系出吳大都督凌統之後，其由閩仕粵，繩蟄於珠江者，則始自宋季雷門公，此百世不遷者也。二世祖方舉公為雷門公塚子，承麻席蔭，沿宦溪遺址奠厥攸居，嗣後支派蕃昌，始分佈於坦頭、石溪二處。是方舉公，又為我宦溪不祧之主也。向未有專祠合祀，子姓惕然不安，屢議卜居鳩工，均以浩費維艱不果，蓋興創若斯之難也。迨至乾隆庚申三月，族眾率祖之念益殷，於是碩侯、維信、郎彥、學光、美三等乃計畝科丁，釀金購地，其經營圖度，幾竭心力，方克底厥成焉。

此時宦溪凌氏又散居於石溪、坦頭等地。

正因為族人分散，所以才有建祖祠的動議。到了乾隆中葉，凌家開始出現仕宦功名人物。乾隆二十六年（1761）《宦溪族譜序》的書寫者即為「進士第文林郎歷湖南邵陽醴陵興寧桂陽等縣加二級記錄四次署長沙府通判直隸靖州記大功三次充庚午壬申癸酉丙子四科鄉試同考官靈山房十七傳孫魚西波甫拜撰並書於耘齋」。宦溪的大宗祠自此以後，成為凌氏族人的重要祭拜場所，光緒二十三年（1897）又對宦溪大宗祠進行了重修，並豎碑刻一通，內容如下：

〈重修宦溪凌氏大宗祠碑記〉

道粵城而東，可水可陸，陸則陂田軫接，水則乘退潮，凡四十里而得東圃，我太祖制置公始家焉，故有洗馬潭。又自東圃而東，亦可水可陸，陸則二里，荷鋤包飯者不絕於途，水則沿江入溪，蒲葦蔥蔭，水木明瑟，農家夾岸春杵，雞犬之聲相聞，鳴榔數折，凡五六里而得宦溪凌氏之衍新堂焉。其陰火羅嶺自大庾南來，崔嵬嶺岸以為屏，其陽果園稻田繡錯，鱗次數百頃，薄海以為砌，外有長洲、新洲、琵琶洲邈迤前橫以為案，左則魚珠鳥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厥宅祝融特起九峰以為表。蓋自製置西曆五世而遷於是，瓜綿虀衍，遂立宗焉，是稱大宗。凡我二三四五六等房所仰望而瞻拜如泰山如北斗者也。祠建於前明，至乾隆六年廓而大之，重修於嘉慶乙丑，迄今又近百年矣，簷瓦宗桷，或蝨以墮寢，室前尤甚。子姓慨然謂：非所以妥先靈也，非所以繼前人創建重修之盛志也。公議以朝錦、俊謙等襄其事，諏吉庀材，人持畚鍤，一日咸踴躍赴，歡聲雷動，新廟奕奕，煥然有光。於是加建祠西青雲巷一帶以輔成壯觀，舊有庖整而飾之，以謹其祭鄉膳羞，建後園繚以周垣，雜蒔花卉，以供親賓之遊賞，右通左達，靡不如意，凡費千餘金，皆取之百益會。

經始於光緒丁酉十月迄十二月告成，屬予記之。予惟是役也，非百益會不為功，猶憶乙丑冬詣宦溪謁祖禮成，諸伯叔父賜宴於堂，談次及百益會章程，誠有味乎？其言之矣。……今果借百益會之儲，重新堂構，襄事者又不懈，益何宦溪之多賢若是？繼自今人文蔚起，遠迪前光，永以弁冕諸房，而作海邦之望族，則斯堂也，與粵城中六房眾建之恢復堂，東西輝映矣，爰不辭而為之記。

時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季冬穀旦
二十一世孫揀選知縣巴酉恩科舉人族侄
孫鶴書頓首拜撰

從碑記內容看，清末東圃仍是典型的環水而居的鄉村社會，水陸交通便利。而宦溪的大宗祠最早建於明代，並於清乾隆六年（1741）、嘉慶十年（1805）及光緒二十三年重修。而且凌氏族入此時已經成立了「百益會」。

《宦溪凌氏族譜》中還收錄了一些祖先的墳塋碑文，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凌氏始祖雷門公凌震的夫人梁氏墓誌銘，詳細記載了凌氏入粵後的事蹟，原文如下：

〈重修顯始祖妣梁氏夫人墓〉

夫人姓梁氏，系出莆田，世為三山望族，年及笄，歸我始祖考雷門公，性行端淑，勤持禮法。公行四，時三長兄，已皆顯貴。夫人與三妯娌事武經，公陳夫人克盡婦道，得其歡心，公登宋咸淳年間進士，時值賈似道誤國，版圖日蹙，公積勳任廣南道，夫人隨翁姑入粵佐公。閱年，公擢廣東都統，封二品夫人。景炎元年十一月，元軍入建寧，少傅張世傑等奉帝航海至潮州，十二月次惠州甲子門，帝遣使詣元請降。二年元軍入廣，陷諸郡。是時，所向望風披靡，擁強兵叛而去者相環，我公與經略張鎮孫誓圖恢復。四月，帝舟次廣之官富場，元將呂師夔聞公與張鎮孫兩路夾

攻，始退走，遂復廣州。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十一月，元將塔出會呂師夔兵，合攻廣州，鎮孫守禦不支，城陷。我公得脫，收拾散亡數千，倚少保文天祥諸軍為聲援，與尚書王道夫各將兵相犄角，再復廣州。有詔：褒諭晉廣東制置使，授光祿大夫，夫人加封一品。帝將復駐淺灣。適元將劉深等來襲，張世傑奉帝走秀山，至井澳，州郡盡陷，帝復奔謝女峽，至七里洋。三年春，文天祥收兵海豐，復出麗江浦，我公拮据戎馬，竭力支撐，三復廣州。待郎馬南寶賦詩志喜，帝遷碭州，四月崩。眾立衛王昺，改元祥興，遷崖山，以我公保有廣州，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忽大星隕於廣州南。至冬，而文天祥被擒，逾春而張世傑舟溺，宋祚遂亡。當我公之三復廣州也，四面皆敵壘，公獨以一丸之地，捍帝於岡州，大小數十戰，自少帝亡後，人無固志，公與元將李恒戰，不利，乃退居東圃，齋志以終。時夫人雖身被恩榮在署，實無一日暇豫，以憂勞先公卒，葬於邏岡火村，土名官田，壬子向之原。繼室郭氏夫人，副室五人，子十三人皆不仕，具詳族譜，不復縷書。茲因年經久遠，墓穴陵夷，無以嘉魂魄，各房父老集議重修，命魚紹述舊聞，原其為顛末。……

時大清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九月初八日吉旦十七世孫進士魚撰。十四世孫奕耀、十五世孫庠生基鞏、十六世孫文儒廩生云、十七世孫歲貢生渭水、國學生爾聚、裔孫明茂，十八世孫舉人高燭等立石。

梁氏的墓誌銘告訴我們，宋末元初，凌震是其中的抗元將領之一，梁氏作為凌震的妻子，在抗元中受到南宋朝廷嘉獎。但梁氏死後並未與丈夫葬在一起。從族譜所載譜系圖看，凌震原配為

梁氏，隨後又與南海都禦使郭公的女兒結婚，後來又納四個副室。

在石溪村的調查中，我們訪談的最後一位老人是劉大爺，但沒有目睹到劉氏族譜。據劉大爺說，石溪劉氏也有族譜，最早可追溯到漢代，其始祖為東漢東平憲王劉蒼，是光武帝的小兒子，曾修禮定樂。宋代建炎年間，第三十四代劉仲敏任南雄州刺史，因足疾辭官，留居南雄保昌珠璣巷，紹興年間從珠璣巷遷居廣州烏衣巷，後又遷到新會。劉仲敏是石溪劉氏始祖，其後八世祖遷到順德，再遷到番禺石溪村。

從以上族譜看，石溪村開村大致在宋代，村內村民大多由北方遷徙而來，此村瀕臨珠江，水陸交通發達，村民以農業為主，後來也有村民走上經商之路，石溪村各族至今仍保持傳統的祭祖、龍舟等活動。

二、石溪村的祠堂與神廟

我們在石溪村中漫步行走，不時會看見一些古舊的建築以及仿古的新建築。最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村中的祠堂和神廟，具有代表性的是仕清秦公祠和光成秦公祠。

仕清秦公祠位於前進村石溪永寧街14號。祠堂大門上方刻「仕清秦公祠」，落款為「光緒庚子孟冬吉旦墨浦梁澄書」，署名下方有兩枚方印。門額兩邊門聯為「天水世澤源流遠，石溪宗枝葉奕長」。大意說石溪秦氏祖先來源於天水。仕清秦公祠大門內左邊是土地神的神龕，右邊有四通石碑，第一通是《仕清秦公祠重建碑》，內容如下：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慎終追遠，孝莫大焉！我太祖悅會公偕長子仕清，自南宋咸淳年間宦遊入粵，由南雄遷居廣州番禺，遂卜築石溪而居，以時考之六百餘年矣！前人念先世創業艱難，特建祠以垂永久。迨今代遠年湮，瓦面則雨雪飄零，棟宇則風霜剝蝕。庚子歲，余叔伯兄弟等報本情欣，群起重修之念。於是老少勸捐，集腋成裘，鳩工大作，不日告成。囑余作文以記之。

曰：歌於斯，飲於斯，聚宗族於斯，相與敦孝友，相與講仁讓，將見蘭桂騰芳，螽斯衍慶，世世相承，有其兆也。是為序。

八品銜國學生二十傳孫宗伯心如氏頓首拜撰

重修值理：顯維、榮和、榮慶、榮燦、榮樂、榮富、榮華、世祥、千相、聯派。

謹將樂助芳名列左：悅會祖助銀三拾五大元、仕清祖助銀三百二拾六大元、萬興祖助銀三拾二大元、榮和助銀五百二十三十大元、榮慶助銀二百五十四大元、榮宗助銀二百四十大元、榮基助銀一百八十六大元、顯德祖助銀一百五十六大元、榮高助銀九十六大元、榮斌助銀八十八大元、顯維助銀七十大元整、榮可助銀五十四大元、千邦助銀三十八大元、思華祖助銀三十七大元、世經助銀三十六大元、聯佳助銀三十四大元、千興助銀三十一大元、千相助銀三十大大元整、千旺助銀二十三大大元、榮標助銀二十二大元、顯發助銀二十一大大元、賢安助銀二十二大大元、華社助銀二十大元、榮樂助銀一十九大大元、榮彰助銀二十大元、榮結助銀一十八大大元、榮棠助銀一十八大大元、子揚祖助銀一十七大大元、榮華助銀一十七大大元、思錦助銀一十六大大元、榮熏助銀一十四大大元、榮燦助銀一十四大大元、顯財助銀一十二大大元、千隆助銀一十三大大元、顯善祖助銀七大元、顯成助銀八大元、聯派助銀七大元、顯祥助銀六大元、榮祥助銀五大元、宗儀祖助銀五大元、郁明祖助銀四大元、思敬祖助銀二大大元、存聚祖助銀二大大元、榮富助銀二大大元、阿威助銀二大大元、華本助銀二拾大大元、本魁助銀二大大元、世華助銀二大大元、閻金助銀二大大元、容桂助銀二大大元、華輝助銀二大大元、阿全助銀二大大元

元、洪兆助銀二大元、華載助銀二大元、肇光助銀二大元、阿江助銀二大元、顯彰助銀二大元、阿標助銀二大元、榮就助銀二大元、阿朝助銀二大元、博學助銀二大元、阿培助銀二大元、世灼助銀二大元、福懷助銀二大元、瑞祥助銀二大元、阿耀助銀二大元、阿國助銀二大元、世祥助銀二大元、阿財助銀二大元、華志助銀二大元、阿昭助銀二大元、思祥助銀二大元、思恩助銀二大元、阿千助銀二大元、阿就助銀二大元、阿妹助銀二大元、阿萬助銀二大元、華煥助銀二大元、阿傑助銀二大元、阿楊助銀二大元、阿斌助銀二大元、阿曉助銀二大元、阿沛助銀二大元、阿澤助銀二大元、帝金助銀二大元、應榮助銀二大元、應培助銀二大元、阿能助銀二大元、阿登助銀二大元、榕滔助銀二大元、樹基助銀二大元、錦波助銀二大元、華北助銀二大元、榮書助銀二大元、阿汝助銀二大元、阿流助銀二大元、阿興助銀二大元、阿浩助銀二大元、榕端助銀二大元、世坤助銀二大元、世亨助銀二大元、世樂助銀二大元、賤溪助銀二大元、聯芬助銀二大元、阿海助銀二大元、鎮宜助銀二大元、福來助銀二大元、福綿助銀二大元、華樹助銀二大元、阿會助銀二大元、帝潤助銀二大元、紹熏助銀二大元、阿鰲助銀二大元、錦全助銀二大元、阿樹助銀二大元、阿桃助銀二大元、阿昌助銀二大元、鎮邦助銀二大元、倫英助銀二大元、阿謙助銀二大元、至順助銀二大元、作昭助銀二大元、金翎助銀二大元、燦焰助銀二大元、阿經助銀二大元、阿春助銀二大元、江橋助銀二大元、傑良助銀二大元。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季秋月吉旦重修立石

這通碑文講述石溪秦氏入粵時間及來源，提到宗祠於光緒時已破敗不堪，族人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動議重修宗祠，二十八年（1902）落成，序文由八品頭銜國學生秦心如撰寫。但仕清秦公祠最早建於何時？該碑文並沒有交待清楚。不過我們從第二通《設立屏門小引》的碑文中，大致可以判斷，該祠至少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甚至之前已經建立了。因為這記述的屏門就是為仕清祖祠所建，內容如下：

設屏於門以蔽內外，古禮也。今我仕清祖祠亦仿此事。但祖蒸淡薄，籍手何從？爰集孝子賢孫捐金樂助，集腋為裘，鳩工庀材，告成指日。將見宗靈妥適，行看後裔蕃昌。謹鐫題助芳名，以垂永久，是為引。

計開首事：紹禮，緒爵，業敬、顯升、顯襄等

緒芝、緒成一錢五分，朝能、顯升以上各一中元、緒朗二錢整，業琪、業韜顯襄以上各二錢五分，業盛、業文、顯邦、顯祥、顯新、業志、業達、業貫、業齊、思成、顯生以上各一錢五分，思群、顯貴、業臻、思麗、思錦、思聘、顯輔、顯楠、顯進、顯榕、顯明、顯輝、業祥、朝斌、方照、潼城以上一錢二分，思登、思安、緒爵、緒權、業君、業敬、業勤、業恕、業勳、業華、緒茂、業龍、業莊、業昌、業萬、業千、業秀、業餘、業英、業蕃、思貴、思潤、思有、思宗、顯有、業錦、業新、思江、思炳、顯富、顯通、業瑞、業另、榮發、榮達、榮壟、業熾以上則一錢整。

乾隆五十五年季秋吉旦

第三通為《創建宗祠小引》碑文，講述秦氏子孫秦紹俸等發起族人共建祠堂一事，從中可以判斷仕清秦公祠建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碑文如下：

古者宗祠之設，原以妥先靈而聚子姓也。惟念□仕清祖向無家廟，我等子孫雖春禮秋祀，欲竭微誠，其何從乎？眾議久思鄉之南隅萬興祖原有吉地一段，四江環拱，眾水滌洄，欲將此地送之清祖建祠第，是我祖祖粒寥寥無門藉乎？是有志而未達也。幸乾隆癸巳，歲豐人和，餘將此志謀之宗族。各皆點額，維欣捐資樂助，告成，然此清祖有靈而致也。俾後來之子孫永昌永熾，端由是基矣。爰序數語，以志大略云。

首事：紹俸、紹俊、緒蕃、緒才、緒芝、緒大、業聚、思朋、思位、顯貴。

今將僉題芳名於後：萬興祖送祠地一段，此地丈尺刻在碑後。永昌祖捐銀柒拾肆兩壹錢整，萬興祖捐銀柒拾肆兩壹錢整。

長房：緒貴、緒大、業舉、業君、業創、業勤以上一大元，思位五大元又七分，思顯一兩整，思錦、思麗以上一大元，思華一錢整。

二房：紹禮三大元，紹志一元半，緒朗五大元，緒傑三大元又一角七分，緒才、緒爵以上二大元，緒豪、緒泰以上一兩整，緒俊一大元，緒光一中元，緒成一錢整，業敬三大元又一角七分，業文二大元，業盛、業鳳、業孔、業秀、思群以上一大元，業昌一中元，思群一大元。

三房：紹俸一大元又九分，紹聖一中元，緒芝五大元，緒熾一大元，緒球、緒倉以上一大元，業琪、業韜以上一大元，業萬一錢整。

四房：緒偉二大元，緒蕃、緒禮以上一大元，業鵠、業能、業泗以上一大元，業達一中元又一角一分，思俊一大元，業信一中元。

五房：子楊祖一中元，思賢一大元，思升一大元又一角七分，思明一大

元又一角一分，思客一錢整，顯兆六大元，顯邦四大元半，顯貴四大元，顯昇二大元，顯輔一大元，顯佐五角五分，祭多一中元，思客一錢整。

乾隆癸巳□□□□□□□□□□

從碑文內容看，仕清秦公祠最早建在乾隆癸巳年（1773），這一年「歲豐人和」，在族人秦紹俸等人發起下建立宗祠，秦氏五大房踴躍捐款。

第四通碑文字跡十分模糊，依稀可見碑頭「仕清、仕傑子孫捐資重修祖墓芳名如下」，由於碑刻字跡十分模糊，故此處不再抄錄，碑刻落款為「西元壬申年重陽立石」，估計是民國年間所為。

祠堂內還豎有落款為2013年的《仕清秦公祠修建碑誌》，記載：「仕清秦公祠始建於清代癸巳年（1713），堂號思敬堂，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重建，自1992年始祖曰會秦公墓重修以來，經耀南、宇雄、光成兄弟不斷努力，祖墓於2005年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把仕清秦公祠創建時間定於1713年，與《創建宗祠小引》一致。

光成秦公祠位於石溪村橋頭3號，祠堂原貌保存較完整，但左廊房頂已坍塌，祖先神位大廳的柱子也已朽壞，現用磚塊代替，屋脊部份損壞，而屋樑的雕花及供養祖先的神龕保存較好。據秦大爺介紹，光成秦公祠建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祭祀的祖先為秦明綱，為入粵十九世祖，字貴登，號祥光，光緒年間五品同知，從事絲綢貿易，還曾在廣州沙面開設時昌洋行，人稱「merchant登」。祠堂內部的前堂、大門後設有中門屏風，後堂四大圓柱及兩側均配掛對牌，屋頂上部周圍均有繪畫，前後屋及兩廊有木雕，祠堂前有花崗石砌成的池塘。祠堂大門處有兩個石凳，門額刻「光成秦公祠」，無門聯。祠堂窗戶上鑲嵌的清末民初的彩色玻璃、雕花已破爛不堪，原來完好的玻璃、香爐、金箔木雕等均被盜。

石溪村的仕傑秦公祠，以石溪秦氏二世祖秦仕傑命名，從《石溪秦氏族譜》看，秦仕傑為

秦悅會第四子。我們考察時，仕傑秦公祠大門已鎖，門額刻有「仕傑秦公祠」五個大字，門額上方畫有八仙賀壽圖，門聯為「宗源天水」、「根繫嶺南」。祠堂兩邊用紅紙張貼有《重建仕傑秦公祠贊助芳名》和《祠堂重光善款》，贊助修建仕傑秦公祠的族人既有廣東人，也有湖南、海南、廣西等地人，可見仕傑公的子孫後來遷徙到各地。

石溪村的凌氏宗祠主要有子初凌公祠，位於石溪村長樂街6號。門前整體佈局與仕清秦公祠、光成秦公祠大致相同，祠堂門額刻有「子初凌公祠」，無門聯。大門左邊牆壁上掛着2012年11月天河區登記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意味着這所建築已經成為文物。我們在和凌大爺的交流中得知，子初凌公祠是以凌震第七世孫凌子初命名，因為他最早帶領族人遷徙到石溪村，所以子孫在此建祠堂供奉凌子初。而凌氏的大宗祠則建於宦溪村。

劉氏大宗祠位於石溪村天祿街8號。據劉大爺說，劉氏大宗祠建於道光年間，最初在村裏的侯王古廟旁，民國時才遷徙到此處，又1954年重修。祠堂大門前有兩根石柱，門額刻「劉氏大宗祠」五個大字，門額上方有壁畫，落款為陳建昌，時間為民國十三年（1924），門聯為「天祿傳家學」、「雲福紹古風」，雙扇大門上分別貼着「文丞」、「武尉」兩字。祠堂內鑲有《學成堂重修祖祠碑記》，從中可知，這座劉氏宗祠是為了紀念元朝光祿大夫劉渭叟的，民國年間因祠破舊，族人遂捐款重修。碑文如下：

番禺鹿步司石溪鄉為皇元光祿大夫劉公渭叟之大宗祠也。面江背嶺，創開鉅麗，簷牙高啄，宏模狀觀。祠□□□，遵萬古聖賢禮樂；左昭右穆，序一家世代流源。此石溪所以有其祠也，祀劉公渭叟。於是間瞻抑德微親依靈爽非一日矣，愀愀歲月，風雨飄搖，勢將頽敝。乙丑孟冬，乃議重修，然經費浩繁，且祖嘗微薄，爰集本族父老昆弟之捐款，事彌從便，氣易為豪，至登壘鉅

賈、聯田富室、縉紳並舉，俾得集腋成裘，即日鳩工庀材，不數月而喜落成，厥功偉矣！崇奉先以為奕世炳耀寧有涯乎？謹志捐款芳名，以垂不朽焉。云爾。

番禺縣立師範學校本科畢業生吳錦章敬撰

經理值事光容、全佳、福培、耀漢、炳甜、敬明、華地、應根

廟頭鄉張萬戶堂香資六元、本村蘇姓香資四元、龍水步房香資四元、珍成堂壹佰大元、三洲祖助銀五百元、珍成堂一百大元、宗枝積慶香資五毛、本村仕清祖香資貳元、本村仕傑祖香資壹元、南洲房香資貳元、南灣房香資壹元、本村凌姓香資貳元、本村徐姓香資壹元、南畝房香資壹元、南裾房香資壹元、東同聚香資六毛、甫福如香資五毛、東源房香資壹元、平涯房香資壹元、子山房香資五毛、普全房香資壹元、呂谷祖香資四元（以下86人略）

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冬吉日闔房子孫等 重修立

從碑文中的捐資名單看，劉氏分佈在廟頭鄉、石溪、龍水埠、南洲、南灣等地，並且捐款也不僅僅局限於劉姓，還有凌姓和徐姓等參與，其中的緣由不明，估計與侯王古廟有關，因為劉家認為侯王古廟祭祀的陳平就是幫助劉家打天下的功臣。

今天的石溪村唯一保留下來的神廟就是侯王古廟。在與秦大爺、劉大爺及凌大爺的訪談中還瞭解到石溪村除了侯王古廟外，還有娘媽廟、觀音廟及華光廟等，但如今除了新建的侯王古廟外，其他廟宇均已不見。

侯王古廟位於前進村石溪天祿街西五巷20號。此廟即《石溪秦氏族譜》中提及，秦明綱捐款所修從侯王廟到牛牯石碼頭的石板路的起點所在。有關侯王古廟的歷史，老人們告訴我們，據說，此廟在明代已存在，幾經重修流傳至

今，現在的侯王古廟是1990年代重建。侯王古廟主要祭祀的是漢初丞相陳平。現今的侯王古廟由一個單獨院子構成，廟正門刻有「侯王古廟」，下款「甲戌年十月建」。廟門前門聯為「六計出奇輔漢興劉稱偉烈」、「威武沐澤文經武緯仰洪恩」，稱讚漢初名相陳平輔佐漢室的功績。廟內一堵綠磚所砌的屏風上畫着八仙過海圖，屏風右邊是一座土地神像，供奉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廟內掛滿塔香，正廳神龕正中安放一大一小兩座侯王，小的在前，大的在後。秦大爺告訴我們，這兩座侯王神像，大的為坐身，小的是行身，主要供游神時所用。侯王左右兩邊還供奉有文昌帝君、陳曹、關羽等神像。劉老大爺告訴我們說，漢初陳平輔助劉邦有功，被封賜曲逆侯，後官至丞相，陳平對漢室忠心耿耿，故全村劉氏商議為陳平建侯王古廟，享受劉氏世代煙火供奉。

劉大爺還告訴我們，以前村裏每年都要定期舉行菩薩巡遊和侯王誕。菩薩巡遊在石溪村附近村落也普遍存在，但巡遊神像不同。如石溪村北面的宦溪村巡遊神像是天后娘娘，蓮溪村巡遊神像是洪聖大王，龍水埠巡遊的是華光大帝，而石溪村巡遊的則是侯王陳平。

石溪村每年舉行菩薩巡遊的時間在農曆正月初十，這一天村民首先要擲杯問神。全村人到侯王古廟，由一位最有聲望的老人向侯王跪拜，擲聖杯，此舉是請示侯王巡遊時是向東行還是向西行。扔聖杯時，擲杯人雙膝跪地，將聖杯高舉過頭，口中問侯王可否西行，然後將聖杯擲地，聖杯擲成一正一反為正杯，表示可向西行；若陰杯（兩塊都反）或陽杯（兩塊都正）表示不可行，擲杯人就改問可否向東行；若擲成陰杯或陽杯，則再次問可否向西行，如此循環，直到擲成正杯為止。擲完聖杯以後，便向可行的方向巡遊。到了巡遊時，侯王像安放在眾菩薩的正中，有一前一後兩尊，前面一個較小的為行身，後面一個大的為坐身。巡遊時行身被安放在神龕（龍庭）內，然後選擇四名剛結婚或近年結婚的男性村民優先抬神龕，其主要是希望抬神龕的人被菩薩保佑，早生貴子，多子多福。

在侯王前行時，護送侯王的「隨從」隊伍很

龐大。一般有16個舉旗人和4個舉權杖的人，他們各執一杆旗或權杖。隊伍左右各有一個花籃，上面放有燃着的檀香，敲鑼打鼓向西（或東）的第一間祠堂而行。此時，祠堂有專人迎接神像。神像被恭敬地迎進祠堂後，要在神位上坐上一天一夜。第二天護送的隊伍又按上一天的儀式將神像送到下一間祠堂。傳說給侯王「坐鎮」過的祠堂，會給該族人保平安並帶來福氣。神像依次坐鎮完村中所有祠堂後，便「返堂」回侯王廟神位上，返堂中要「過火坑」，即在一塊地面上鋪滿燒着的稻草，4個抬神像龍庭的人，要迅速從燒紅的稻草上跑過。據說這代表「旺」，所以村中的青年男性都爭着「過火坑」，尤其即將結婚生子的青年，有機會充當這一角色，就意味着會行好運。

另一個紀念侯王的節日為侯王誕，陳平誕辰為每年農曆四月二十八日。當天，石溪全村非常熱鬧，大家會沿街擺滿小攤販，賣燒豬、紅白包子、荔枝、熟蟹、雞等食品，這些物品都是拜祭侯王的用品。這一天全村村民會把這些祭品帶到侯王廟燒香拜祭。祭拜完後，將貢品帶回家食用，據說可以給食過的人帶來好運。

三、石溪村民熱心社區公益活動

石溪村民熱心社區公益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講，祠堂、古廟等也屬於公益活動的一部份，只不過祠堂側重於血緣關係，而神廟則側重於地緣關係。其實，晚清以後，石溪村隨着廣州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得到發展，私塾、公路、碼頭的修建以及龍舟活動的舉辦，都開展了起來。

我們在石溪村考察了榮和私塾，其位於石溪村永寧街18號，為秦氏族人所建。秦大爺告訴我們，該私塾由石溪秦氏第十七世祖秦榮和所建，主要供家族子弟讀書，偶爾也接收村裏其他姓氏的孩子。從私塾門額右邊題「光緒癸卯仲冬穀旦」看，此家塾可能建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門額上刻「榮和家塾」四個大字，為黎橋謙所題。榮和私塾現已是天河區登記文物保護單位。

而建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綠筠溪館，位於前進村石溪橋頭街4號，也是秦氏家族孩童

讀書之所，倡建者為秦明綱。村民們又稱之為「花廳」。據秦大爺介紹：綠筠溪館宅院正門呈回字形，門框鑲嵌「綠筠溪館」門額，由順德籍李文田的入室弟子「嶺南四大家」之一的吳道鎔所題，時間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吳道鎔（1853-1935），番禺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光緒二十九年（1903）被聘為廣東高等學堂總理。1931年曾任《番禺縣續志》總纂。綠筠溪館外形保存尚好，內部相當破敗。2005年9月，廣州市公佈綠筠溪館為登記保護的文物單位。在綠筠溪館門口左邊牆壁嵌有一通《遷街助地助金題名碑》，時間為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月初一日。碑文如下：

嘗聞福生有胎，培其胎，禎祥不指日而至耶？蓋我鄉遷街，正植福事也。鄉之西街，羊腸崎嶇，前人欲撤往涌邊至為便，但有志而未逮。今集眾以謀，一鼓而事畢舉。或捐地尾、或捐金，人無吝嗇。繼以費用不充，請銀會助其不足，各□□□昕昕踴躍。昔之所難，今舉之易，是必有默助於其間者也則如砥如矢，君子所履多福，從此而始基之矣。

首事秦伯進、劉鳳全、秦伯綱、劉鳳齊。

謹將助地助金芳名開列如後：秦伯舉、秦伯紀、秦伯觀、秦伯盛、秦公式、秦伯俊、秦喬嶽祖、劉君彥祖、秦□富祖、秦家俊、秦萬朝、劉文偉祖、劉大賢補貼磚銀一兩，秦大勝、秦伯秀、劉仕成、秦伯艱祖以上捐地尾作街。

秦嘉俊助金花小一大元，劉鳳昭助金小一中元，劉鳳齊助金花小一中元，秦嘉潤助金花小一中元，秦嘉聰助金二，秦伯綱、秦萬禮、□□□、□□□、黃敬賢、秦朝聚、秦伯堅、劉仕熏、秦伯俊、劉稱秀、劉鳳全、秦伯東、秦伯雲、秦伯舉、秦公拜、秦宗

富、秦伯英、秦公銓、秦嘉國、秦朝長助金六分，秦公卿助金五分，徐廣大助金五分。

會首龍匯溪，首事劉鳳全、秦伯俊、□□□，秦伯綱共充合銀以街。宣德祖、龍□祖、龍廣祖、劉鳳谷、徐聯芳、劉鳳起、徐廣客、劉鳳璘、劉鳳齊、劉鳳跟、劉鳳峻、劉鳳錦、義勝會、劉鳳望以上俱合□共□□□□分，會期議十月初一日八月初一日為定。

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敬鑄

從碑文的捐助者姓氏看，乾隆二十六年石溪村主要以秦、劉、徐為主。從捐助情況看，捐款多為銀兩，僅有秦伯秀、劉仕成、秦伯艱等捐地尾，其餘人只捐金銀錢財。就個人捐數額看，捐款最多的以秦、劉為主。

石溪村現還保存有一通《修建牛牯石埗頭碑》，展示了村內修建碼頭的歷史。這通碑現放置在光成秦公祠門旁，碑名已不可見，據秦大爺說，此碑名為《修建牛牯石埗頭碑》，刻於宣統三年（1911）秋，石碑由花崗岩構成。碑文主要記載了清末富商秦明綱等捐款修建牛牯石埗頭一事，碑文內容如下：

蓋聞修橋砌路，利物即以濟人，樂善好施，修德自然獲報。此德和輿梁，古人所以作成於農隙時也。我石溪鄉之有牛牯石埗頭，由來久矣。代遠年湮，僅存基址，上落者未免苦其泥濘。元年四月，里人秦祥光，慷慨慕義，獨起而興築之。塢已經營，用過銀三百圓，誠為鞏固，大有益於我鄉。僉曰此善舉也。然埗頭為上落所必經，斯路亦門鄉所□□苦，乃曰基崩陷，因為難於跋涉，未免大失觀瞻。維時欲步祥光後塵者，本不乏人。第以竭一人之力，何如合眾人之長。是以侯王廟敬請闔鄉紳耆會議，由舊路石溪閘門起，用兩塊石砌至牛牯石埗頭止。又由侯王廟側砌至廟前止。其間基坐窄者填

闊之，低者築高之。合計應用工料銀若干。然後設緣簿助捐。居者隨緣樂助，行者踴躍捐輸。務使集腋成裘，固主義舉。所謂眾志成城，一呼而築也。至其中田基兩邊路，佔基少者，由眾紳耆邀齊各田主，至廟面商，倘得慨然築就固佳，即或有道而未允者，由各以義不容辭，共躋公益。此固一鄉之體面攸關，亦百年之攸關盛衰也。是為序。

秦祥光認埗頭全個，約銀三百大元，秦作佳助銀二百大元，祥經和助銀一百大元，細絲綸助銀五十大元，德昌綸助銀五十大元，廣和興助銀五十大元，劉詔和助銀五十大元，彭秀良助銀五十大元，永紹繡助銀四十大元，永紹尋助銀四十大元，時昌行買辦秦祥光助銀一百大元，陳□伯助銀三十大元，何壽生助銀二十大元，馮仲唐助銀二十大元，□□助銀二十大元，建興助銀二十大元，秦興成助銀二十大元，均倫成助銀二十大元，□百□助銀二十大元，□□□助銀十五大元，何伯認□草田，□□胡壽朋，以上各助銀二十大元，陳仲□以上各助銀二□，秦光□銀□□□，秦明梁、□□□、福記店助銀七元，□□店秦助銀一大元，以上各助銀。秦朗、秦順昌□、和里梁助銀若干，劉桂池□助銀百□元，劉日□、劉□珪、劉□□、劉炳華、劉□□、劉金朋、劉□燕、劉宜□、劉宜約、劉一□、□青里樂助銀芳名，秦萬□堂助銀一百五十大元，秦昌藥堂助銀四十大元，秦榮□、秦榮基、秦□□、秦世□、秦於□、□□□、秦□義、秦芳名、秦容海、秦榮紹以上各助銀一中元，秦俊昭助銀二毫。

宣統三年重建石路，劉炎光、秦祥光秋吉立。

石碑由於常年腐蝕，字體已較模糊。從碑文可知此次修建牛牯石埗頭，得到秦、劉及各大商鋪鼎力相助，原因可能是該埗頭是位於石溪村珠

江邊的古碼頭，是全村和外面世界聯繫的重要通道。值得注意的是，修建碼頭的眾議是在侯王廟內進行的，說明神廟在鄉村社會是討論公共事務的重要場所。此次重修牛牯石碼頭還附帶修建從侯王古廟直達碼頭的石板路。牛牯石埗頭的修建一方面是加寬，另一方面是加高。當然，絲綢商人秦明綱的積極參與謀劃，應該還說明，牛牯石碼頭是石溪村商業活動的最重要出口。

我們調查時發現在石溪村的祠堂或重要通道上多貼有龍船會的告示，因為此時剛過端午節不久。石溪村的龍船會主要由秦、劉兩家分別舉行，秦氏由秦氏龍船會主辦，劉氏則由西約龍船會主辦。兩家龍船會主辦前都有酬神活動，在酬神當天都會邀請全村父老鄉親聚餐。秦氏聚餐每人一般繳納10元的餐款，劉氏一般為20元。從秦氏龍船會捐款名單看，捐款不局限於秦氏，也有蔡、何、黎、黃、張、陳、劉、鄭、許、王、孫、葉、龍、鐘、莫、謝、馮、曾、林等眾多姓氏參加，可見秦氏廣泛發動其他姓氏參與。劉氏龍船會2014年6月4日公告顯示，贊助者97人，大多為劉氏族人，外姓僅有秦松光、黎志祥、何偉海、何冠斌、袁業培和袁偉強6人。秦氏龍船會一般從初一到初五，龍船從深涌出發，一直航行到廟頭。但奇怪的是村內並沒有發現凌氏龍船會的痕跡。

四、小結

石溪村自宋代開村以來，至今已經走過了千年歷程，這個古老的村落在歷史時期的變遷過程中經歷了由傳統農業向工商業轉變的選擇，至今在廣州現代化的大潮中，已經完全遠離了農業，村內高樓林立，老式建築的祠堂、神廟、私塾等，與現代化的建築交相輝映，向世人展示這裏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但在現代化不斷強行推行的過程中，如何保留傳統文化，也就顯得愈益重要。今天石溪村的龍舟會似乎說明，在現代化的當下，傳統文化依然是凝結民眾的感情紐帶，而侯王古廟的重建與祭祀活動，似乎也在彰顯傳統文化的魅力。

戰爭、日常生活和近代中國—— 「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黎志剛 袁子賢 楊彥哲
昆士蘭大學歷史系

「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於2013年10月15日至19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召開，旨在探討戰爭對近代中國所產生的影響。這次會議彙集了來自澳大利亞、中國、香港、日本和加拿大的學者，圍繞着近代中國的衝突這一主題，進行對比和討論。從地理上，關注從中國的西北邊境，到東北、黃海、日本，以及重慶等地區。就時間跨度而言，會議內容涵蓋從19世紀晚期到21世紀，話題廣泛，包括戰術學，戰爭回憶、版畫以至微博、軍閥與社會轉型、戰時之商業與外交以及戰爭對士兵的影響等議題。這種多樣性的議題展示了本次會議的主題：戰爭不僅僅局限於戰鬥——它包含了社會的各個方面，並且在戰爭結束後，仍然持續長時間影響社會。與會學者圍繞着「戰爭的社會影響」這一主題，就學界關注的論題進行討論。例如，戰爭是如何控制與影響社會？在文教活動、媒體建設和政治的權宜中，衝突是如何發生？主要觀點是：戰爭是一種社會問題嗎？正如會議召集人昆士蘭大學歷史系黎志剛（Chi Kong Lai）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James Flath所言，戰爭所帶來的影響並不單存在於戰爭進行的過程之中，這種影響往往延續至戰後並且遍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由此，通過戰爭及其衍生物這一視角作為切入點，將有利於加深我們對於近代中國乃至當代中國所形成的種種格局和現狀的理解。

綜言之，本次會議為戰爭研究提供了更多樣化的學術取徑，以不同議題，讓我們重新審視戰爭與社會之關係。從這一框架不難看出，本次研討會有如下幾個特點：

1、為中國近代戰爭史的研究發掘新的歷史材料及敘事方法——如西方的記錄及親歷者個人的回憶視角等；

- 2、關注「網路戰爭」這一種隨着近年通訊技術的發展而逐漸在虛擬領域出現的全新的戰爭模式及其影響；
- 3、探討戰爭對於近代中國社會轉型所產生的影響；
- 4、通過商業、外交及日常生活的角度來觀察戰爭；
- 5、考察戰爭對於其參與主體——即士兵——所產生的影響。

本文對本次研討會各場次的演講及討論分別作一簡單回顧。

學術會議前，主辦單位有兩個重要的公開活動，分別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鄭秀強（Victor Shiu Chiang Cheng）的專題講座——「重慶和談：重新審視」，以及昆士蘭大學歷史系學生讀書會小組的專題報告。兩場學術活動，皆從新的研究取徑，關注過去戰爭史研究較少觸及的面向，探討戰爭在各種議題上的影響，提供不同的詮釋觀點。

以往，有部份學者認為重慶談判雖然是一起轟動一時的歷史事件，但其實質意義與其知名度及歷史地位並不對稱，其談判過程也不像人們想像中的那麼有趣。¹最近，部份學者更認為，在戰後中國的政治、軍事等各種條件的限制之下，戰爭才是當時歷史發展的「主旋律」，²和談只不過是一個小插曲而已。³鄭秀強首先將時間場景拉回1945年9月重慶會談的現場，通過整理雙方軍事資本與佈局的相關史料，並結合談判心理學的視角，探討國、共兩黨談判人及美國調停人在短短六周的談判中，對中國戰後的和平進程所作出的努力。透過對重慶談判中各方使用過的談判以及調停技巧的分析，看到的是談判並不光是一個博弈過程那麼簡單。在和平談判中，最為重要的是

如何協調各方不同的觀點和利益。在更多的情況下，作出談判妥協的氣量，要比從事可怕與危險的軍事賭博的匹夫之勇更可貴。透過重慶談判的歷史，可以看到的是人們之所以珍惜和平，恰恰是因為它脆弱的本質。重慶談判並沒有為中國帶來永久的和平，但國、共雙方在談判過程中所提出過的各種妥協方案，實際上是對後來的國共內戰提出了一個，現今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要面對的血淚控訴：戰爭，並不是當時國、共雙方的唯一選擇！這一場以軍隊增減為目的的談判，充分展現國、共領導者不同的思維，以及國內、外各方權力的交互關係。

延續「晚清與近代中國日常生活史」國際學術會議的傳統，⁴ 昆士蘭大學歷史系學生在本次會議中，針對2013年出版的戰爭研究最新論著，與民國戰爭史學術作品，進行深度討論。這幾本重要著作，或提供新的研究取徑、或使用新史料，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戰爭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首先，Joshua Lovett以*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⁵ 一書，從軍人日記，理解國家和個人的戰爭論述如何相互交織，Lovett認為本書借用Michel Foucault的權力理論，以日記進行文本分析，說明我們重新書寫戰爭時期軍人的集體傳記。*Writing War*提供如何使用個人史料，理解戰爭中的集體記憶與經驗；而*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⁶ 一書，則從庶民視角，觀看太平天國的興衰，對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報告者袁子賢（Chris Yuan）認為*What Remains*採用《庚辛泣杭錄》的文學作品，說明太平天國時期，人們如何生活於兩個國家體制之下；並透過《兩江採訪忠義傳錄》的報導，探討太平天國覆亡後，戰爭對人們精神與生活上的影響，以及國家、百姓對戰爭記憶的建構。袁子賢肯定該書能幫助我們從庶民觀點，重新認識太平天國的戰爭日常生活史，此外，袁子賢亦建議未來亦可藉用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考察，從碑刻、族譜與宗教儀式中，獲得更多文本以外的史料。吳曉璐（Xiaolu Wu）報告*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⁷ 一書，將目光轉移到戰爭史研究較少關注的婦女群體，以

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地區的婦女為研究對象，透過口述歷史，重新賦予女性在戰爭史中的話語權。吳認為本書訪問的婦女，背景多元，從她們的回憶講述中，能幫助我們發現群體對戰爭記憶的共性與差異。Adrian Raftery在*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⁸ 一書報告中，從國民黨軍隊建置的時空背景談起，並就軍隊本身與國家政策兩個維度，討論戰爭時期民族主義興起與社會流動概況。評論人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粟明鮮（Mingxian Su）認為，這幾本2013年的新著，各自提供不同研究取徑，將戰爭研究從宏觀視角，移轉至微觀的個人與社會群體身上，重新理解戰爭對社會與個人的影響。鄭秀強肯定這幾本新著的學術貢獻，反映戰爭史研究的學術轉向。James Flath強調，讀書報告中討論的著作，採用不同的史料與取徑，圍繞戰爭的影響與日常生活，恰恰呼應本次國際學術會議的兩大主軸，成功拉開會議的序幕。

會議首場的主題演講相當精采。在演講開始前，昆士蘭大學歷史、哲學、宗教與古典學院（School of History,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lassics,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院長Martin Crotty發表了簡短的引言，將澳大利亞戰爭史學界對戰爭回憶的研究與中國同行的研究狀況進行了比對和分享。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演講由香港浸會大學麥勁生（K.S. Ricardo Mak）的〈黃海海戰的幾個主要問題：關於漢娜根報告（1854-1929）〉，以及日本愛知文教大學吳嘉寶（Ka Po Ng）的〈中國的不安全性和國家發展〉兩篇論文組成。兩位主講者以新史料與國際關係的視角，跨越區域的囿限，帶領我們重新反省戰爭的當代意義與研究趨勢。北洋水師是清朝建立的近代海洋艦隊，其規模與建制堪稱亞洲第一，但在1894年黃海海戰中，北洋艦隊卻輸給日本的聯合艦隊，自此，日本海軍掌握黃海海域的制海權。過去對甲午戰爭的研究，學者多使用中國與日本的官方史料，瞭解黃海海戰的勝敗原因與雙方的策略。麥勁生的專題演講，直指黃海海戰的重要問題在於戰術上的決策，試圖進一步探討是誰決定改變北洋艦隊的陣型。麥教授採取以往較

少見到的西方史料，時任李鴻章的海軍顧問，德國退伍軍官漢娜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4-1925）的報告，進行史料爬梳；並透過丁汝昌的報告與戚其章描繪的飛橋會議，幫我們從漢娜根的視角，回到黃海海戰的現場，去看傳統史料中沒有書寫的部份。事實上，麥勁生的專題演講以漢娜根的報告為切入點，為黃海海戰的研究提供一新視角，目的並不在於追究是誰下的決策指令，而是示範如何透過新史料，讓我們重新看見歷史事件的新圖像。他指出新材料的發掘，尤其是近代以來西方在華活動者的相關記述材料，將有助我們發現新的歷史線索，乃至填補過去相關研究中由於缺乏史料導致的空白。吳嘉寶以〈中國的不安全性和國家發展〉為題，指出在不同年代的經歷、環境、意識形態等因素下，自毛澤東以來包括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至習近平這五屆中國領導層如何看待戰爭這概念，由此分析戰爭及地緣政治所帶來的安全隱患對於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影響。評論人昆士蘭大學德國史專家Andrew Bonnell針對麥勁生的演講，由德國學術界對全球史的發展和世界戰爭歷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強調通過研究本國與外部力量的互動，來考察本國的相關歷史事件，是一個值得留意的視角。Bonnell認為未來研究中國近代戰爭史，也可從國際關係的視角去理解。本場演講的另一位評論人邱垂亮針對吳嘉寶的演講，指出要瞭解中國的國防思想，及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縈繞在領導人腦海中的不安全意識，應當將觀察視角進一步向前推移至秦始皇的帝國時代，而不僅僅局限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中國。此外，除了來自外部威脅之外，來自中國內部的不穩定因素也將是中國所面臨的安全隱患，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昆士蘭大學孔子學院講座活動中，澳洲格里菲斯大學馬克林（Colin Mackerras）從豐富的西方媒體、學術論著、電影、網路社群媒體和一般民眾對於中國崛起的看法和觀感，探討中國形象與發展的轉移。馬克林引用Martin Jacques⁹和Susan Shirk¹⁰的著作，認為中國崛起對世界經濟是有正面影響；反之Troy Parfitt¹¹則認為中國仍處於兩個極

端化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尚有待觀察。但是，近年來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經濟與貿易合作夥伴。馬克林總結西方的觀點，認為中國崛起已是發生中的事實，她的強勢必挑戰西方霸權。馬克林分享自身在中國旅遊與生活的經驗，提供刻板印象以外的中國，告訴我們中國已經慢慢在改變，我們必須打破以往的迷思。

「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會議中發表的學術論文，有以下特色：

1、新史料和新方法的運用

在「戰爭與回憶」的場次中，主講人為來自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的Terrance Hayes及James Flath。Hayes的題目是《在大毛拉穆薩·塞蘭米的歷史寫作中的蒙兀兒斯坦的滅亡與中國可汗的力量》。Hayes依據維吾爾史學家大毛拉穆薩·塞蘭米（Molla Musa Sayrami）的作品*Tarihi Aminiya*中的記述，回顧十九世紀中葉發生在新疆地區的穆斯林動亂及清政府對於新疆地區的管制。由於這一敘述出自當事的維吾爾族本族史家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別於漢族以及西方史學家的敘事方式。同樣是對於戰爭的回憶，James Flath的〈戰爭與流行文化：前傳〉則另闢蹊徑，通過幾幅年畫作品來探討民間的畫匠是如何認識戰爭，進而探討底層民眾對於戰爭的認識和回憶，其涵蓋的歷史時期包括第一次中日戰爭、義和團暴動及1920年代的軍閥混戰。Flath還闡釋了日軍及其他力量是如何通過年畫等流行於民間文化形式，來向民眾進行意識形態灌輸，並以此塑造自身的正面形象和對手的負面形象。Flath以圖像分析方法，試圖描繪當時庶民眼中的義和團與外國人形象，甚至指出畫中日本人具有西方形象的問題，顯然當時中國百姓的國籍與地域概念是相當模糊的；但另一方面，庶民美學作品卻是中國百姓與世界資訊接觸的唯一管道。評論人昆士蘭大學Melissa Curley認為兩篇文章都透過不同的敘事作品，理解戰爭記憶與國家的建構。昆士蘭大學古典學系的David Pritchard則強調文化總是在歷史的前端，我們在看國家與民族主義之際，必須瞭解文化的根本；他並進一步肯定兩位主講人使用不

同的史料去觀看歷史，Hayes的演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使用一份親歷這一事件的本族精英所創作的文藝作品。他指出，通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歷史事件，Flath則使用流行文化去理解庶民眼中的戰爭記憶。因為文化與歷史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相關的文藝作品往往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歷史環境，和同時代的人們對某一歷史事件的認知。綜言之，兩篇報告採用新史料和新方法，理解發生於19世紀的戰爭歷史，如何影響着中國的發展。

2、關注網路與虛擬戰爭

在「虛擬戰爭」這一場次的演講中，戰爭由近代真槍實彈的熱兵器戰場轉移至當前虛擬的網路環境。兩位演講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目前在中國地區已逐漸普及的新浪微博作為研究對象，圍繞一系列熱點事件及伴隨着微博的發展而衍生出的種種概念，對存在於微博這一虛擬平臺之上的戰爭，對中國政府及社會的影響進行了探討。

昆士蘭大學楊陽（Yang Yang）發表了題為〈今日中國的網路戰爭〉的演講，全面探究今日中國網路媒體的發展。楊陽認為微博是一個庶民發表言論的平臺，同時也扮演政府決策的風向球。與楊陽女士所持的觀點不同，來自昆士蘭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的王洋（Wilfred Yang Wang）認為微博已經具備推動政府決策的功能。他所發表的〈捍衛廣東話：微博與廣州地域身份認同〉，以2010年在廣州爆發的「保衛廣東話」運動為例，詳細闡述了事件的始末，並指出正是借助微博這一虛擬平臺，民眾才得以組織起來，形成輿論壓力並且逐漸發展為街頭運動，迫使政府最終放棄了「廢粵」的決策。本場評論人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研究網路議題專家Paul Turnbull指出，如今日益發達的網路社區及相關平臺對於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及實踐言論自由，和推動社會變革等方面確實發揮積極影響，他以近年來發生的墨西哥與埃及大遊行兩個例子闡釋了這一觀點，認為網路確實說明民眾對公眾議題的參與與討論，未來對網路的研究必須更着重於其社會功能與意義。

3、探討軍閥與社會轉型的關係

「軍閥與社會轉型」這一場次的演講主要探討作為戰爭的衍生物，同時也是戰爭主體之一的軍閥，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往中國學界對軍閥研究主要圍繞各派軍閥的派系鬥爭，而對軍閥評價也以負面居多，¹²而本場演講則嘗試為學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來考察這一問題：一方面主講人將研究重點由戰場轉向軍閥在社會轉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嘗試撇除成見，以一種客觀立場重新對軍閥進行評價。

粟明鮮的講題為〈桂系軍閥與1936年「六一運動」〉。在該演講中，他圍繞「六一運動」這一歷史事件，從地方社會發展的視角，以廣西省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層面的建設，闡釋了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軍閥，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在對日鬥爭策略上的衝突，以及他們作為地方勢力，與蔣介石的中央勢力之間的權力鬥爭。粟明鮮認為，1937年左右，中國出現的「表面上的統一局面」及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與桂系等地方軍閥的活動有着密切的關係。評論人鄭秀強從事件中各派系公開言論、宣傳品和相關謠言，及日本公開桂系從日方購買軍火的動機，來還原這一事件在各方想像和解釋上的真實性問題與粟明鮮討論。

關於韓復榘對山東省鄉村建設運動所產生的影響這一課題，在過去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以致缺乏相關的專題研究。不少討論韓復榘在主政山東時期所推行的經濟社會建設的論文，亦鮮有提及韓氏與鄉村建設運動之間的關聯。¹³即便部份學者曾經嘗試撰寫關於韓復榘與鄉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梁漱溟之間的互動，對於韓氏是如何支持鄉村建設者實施其鄉村改造計劃以及對山東的鄉村建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仍缺乏清晰的脈絡，同時在對韓復榘評價方面，仍難以擺脫以往對軍閥這一群體進行負面的評價。¹⁴在本場演講中，昆士蘭大學歷史系楊彥哲（Yan Zhe Yang）所發表的〈軍閥與鄉村建設：以鄒平為例（1931-1937）〉一文，幫助我們省思今日現代化建設所衍生的諸多問題。該報告以1931年至1937

年在山東省鄒平縣所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為例，通過軍閥韓復榘與梁漱溟之間的互動，探討軍閥在推動鄉村變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同時，楊彥哲指出鄉建派與軍閥的合作，以及此後國民政府對鄉村建設運動態度的轉變，也可視為中央與地方各派軍閥勢力相互競爭的結果，而這一競爭亦可視作1920年代軍閥混戰的延續。

香港浸會大學鄭智文（Chi Man Kwong）表示，楊彥哲所作之報告清楚地回顧了軍閥與鄉村建設者之間的合作，同時把鄉建派這一獨立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的第三股改造社會的力量引入了我們的視野。不過也正如該報告中指出，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有賴更多相關材料——尤其是統計資料——的補充，方能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結論。

4、回顧戰時的商業與外交

研究抗戰大後方企業發展的張守廣教授，曾言：「西南企業家在抗戰時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盧作孚曾經發揮了其他任何企業家無法替代的重要地位。」¹⁵ 在「商業與外交」的場次中，黎志剛在〈戰爭對盧作孚與民生公司在戰時重慶商業活動的影響1938-1945〉一文中引用《嘉陵江日報》、《民生公司簡訊》、《新世界》、《北碚月刊》、《良友》等新的史料，加上黃立人主編的《盧作孚書信集》、各種版本的《盧作孚文集》和民生公司檔案，詳細介紹了盧作孚所領導的民生公司，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運作及戰時經營管理的問題，以及盧作孚本人如何運用非常手段，動員其公司力量為抗戰提供支持。針對戰時盧作孚在重慶地區的商業活動進行深刻討論，黎志剛首先從民生公司在抗戰初期，宜昌大撤退中如何保持大後方實力、民生公司和合資企業對大後方城市化的建置、北碚城市化等方面作一分析。黎志剛認為盧作孚的企業運作與理念，採取軍事的管理策略對重慶地區，特別是盧作孚控制的北碚，以及其控制的企業社區之軍事化城市文化有深遠影響。黎志剛進一步討論民生公司對大後方城鎮規劃，與文化思想上造成的衝擊和影響，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討論。吳曉璐於〈衛生、制服與認同：戰時重慶的日常生活〉一文，

通過衛生、消費、制服等社會經濟文化層面，探討戰爭對重慶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吳曉璐以制服為出發點，通過考察公司、工廠女工、大學生等戰時服裝的要求與變化，來看戰時重慶民眾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方式之變化。評論人呂志偉則建議，對戰時日常生活的研究，未來可借用現代性「modernity」的理論進行分析。甘肅農業大學人文學院楊軍偉（Junwei Yang），在〈1930年代的日美關係與抗日戰爭的爆發〉一文中，則從外交層面，展示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及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前，美國與日本在遠東問題上的種種互動。楊軍偉認為，正是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中日戰爭問題上採取孤立外交政策，放任了日本的擴張，最終導致其開展全面侵華行動。在自由討論環節，鄭智文建議，在外交活動上的研究，未來也可以從史料中，更深刻的掌握當時的問題與狀況。鄭智文從技術層面就英美干涉日本侵華行動的可能性提出了質疑，他認為在彼種環境之下，由於補給線過長，而且尚未有合適的基地，英美幾乎不可能派遣主力艦隊進入東亞威懾日本。楊軍偉對此作出了回應，他認為早在鴉片戰爭時期，英美等西方列強的軍艦便已進入中國東南沿海及長江流域巡航，因此他們完全有能力在東亞部署一定的軍事力量進行必要的干預。

5、描繪戰爭科技對士兵日常生活的影響

最後一場演講的主題為「戰爭對士兵的影響」，這一主題亦可算是本次研討會的最大特色所在，由鄭智文、袁子賢及Morris Low所作的三篇報告，將研究物件鎖定在武器裝備和日常生活這一通常為人所忽略的角落，以下層軍人的視角對戰爭進行解讀。

鄭智文的報告以〈詭秘戰術的代價：奉軍1919-1931〉為題，詳細介紹戰爭中的新科技，如何幫助地方軍閥進行現代化軍事活動的建制。鄭智文透過奉軍新式的科技在裝備、訓練、軍人的素質及戰略戰術上的現代化轉變，並分析了這些轉變為士兵、及當地社會，特別是奉系的經濟和外交所帶來的影響。鄭智文系統性的梳理奉軍在現代化武器與軍備上的發展，在奉軍從法國引進

新型號的大炮與飛機之後，武器的進步亦影響軍人的制服、營養與隊型，以及訓練。鄭引述豐富史料，並運用大量影片，讓我們看見奉軍在軍隊現代化方面的努力。過去，學術研究對張作霖的評價，多從政治層面去理解其與日本、國府的競合關係；但鄭智文認為，我們或許可以從奉軍現代化的軍需與地方關係，去理解張作霖的某些政治作為。評論人鄭秀強認為有三方面可作更深入的探討：一為武器現代化與軍事戰略、戰術現代化之間的落差；二為從更長的歷史脈絡和「地方文化」在軍事科技擴散過程中對奉軍軍事現代化所產生的作用；三為從奉軍與其他地方軍閥在軍隊現代化建置上的異同之處，以彰顯奉軍的特殊性。

袁子賢以一位國民黨軍人的日記為基礎，撰寫了〈抗戰時期國民黨軍人的日常生活〉一文，通過研讀這份珍貴的一手資料，嘗試還原抗戰時期國軍士兵這一群體在戰時的真實生活狀態。文中透過私藏的低階軍人日記與其他已出版的日記、文學作品與回憶錄，幫助我們理解抗戰時期國民黨軍人在兵源、軍需、補給、訓練與裝備上的匱乏，並從軍人的日常生活理解其飲食、生活、衛生、娛樂、男性環境，以及他們如何面對戰場的死亡經驗。評論人鄭秀強認為本篇文章必須再對國軍軍隊做明確的定義，並從政府的相關檔案中，探討政府如何應對與解決軍人的日常生活問題；亦建議袁子賢能更著重於軍隊在戰爭時期的犯罪問題來分析。而同樣來自昆士蘭大學歷史系的Morris Low在〈家庭、復員士兵與戰後日本的殘傷生活〉一文，則將研究物件從中國移轉到日本的普通士兵，Low透過電影與口述訪談，描述了戰後日本對於退伍及傷殘軍人的處置，聚焦於日本軍人在戰後如何回到家庭與社會，伴隨他們的戰爭經驗，又如何影響他們的情緒、人生觀與回憶。此外，也討論了戰爭對於這些軍人的精神狀態及家庭關係所帶來的影響。Low將戰爭對軍人精神上的影響與衝擊，做了非常細緻的描述。但在研究史料上，必須思考電影呈現的文本是否受到某種意識型態的干預，而影響其真實性。評論人John Weik非常肯定Low的研究價值與意義，

Weik認為日本軍人在戰後承受的精神壓力非常沉重，軍人回到日本社會後，不僅要面對文化適應上的衝突，更挑戰他們強烈民族主義的價值理念。會議最後由格里菲斯大學旅遊孔子學院院長Leong Liew和會議召集人黎志剛進行總結。Liew表示這次會議開拓了學術界對戰爭史研究的視野，運用新史料、跨學科的領域，着重戰爭之於社會及個人影響的各個層次，甚具意義，也非常成功。

整體而言，「戰爭對近代中國之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緊扣「影響」和「日常生活」兩大命題，對戰史的研究範疇進行了拓展，與會者認為對戰爭的研究不應僅僅局限於戰場本身，戰爭的影響是多層面、持續性的。透過不同層次的研究，學者們從各個視角、運用各種新的史料、媒材，讓我們看見戰爭研究新的發展方向。由此，本次研討會的參與者從戰爭史領域的相關學者，跨越到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文化史等方面的專家，共同參與討論並發表他們的成果，這一舉措也大大豐富了本次研討會的內容，來自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與會者也由此得以享受跨學科交流所帶來的靈感與新思路。此外，本次研討會也為年輕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平臺，發表他們的新成果。本次研討會的部份論文將考慮在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期刊陸續發表。

註釋

- ¹ 如Oliver Edmund Clubb認為國共雙方在重慶和談中，並沒有任何進展。白修德（Theodore White）則以「一個沒有意義的宣告」，形容這場會談。鄧野以「這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值得被慶祝的階段」評論會談的歷史意義。
- ² 金沖及從毛澤東的文稿、電報、書信、講話紀錄和會議記錄中，探討共產黨在重慶和談中的策略與計劃。參考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楊奎松從《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的實質內容，探討國共雙方對和談的各自表述，以及蘇俄、美國在促成會談上扮演的關鍵角色。參考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抗

- 戰前後國共談判實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頁255-296。汪朝光則就國共雙方的策略討論重慶會談的內容，以及其造成的社會與國際影響。詳見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27-52。
- ³ 有關的論點參見鄧野，〈論國共重慶談判的政治性質〉，《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頁30-64；汪朝光，〈戰與和的變奏：重慶談判至政協會議期間的中國時局演變〉，《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頁14-42。
- ⁴ 讀書會小組報告是昆士蘭大學歷史系主辦國際學術會議中的一項傳統，旨在透過最新論著，理解近年來研究的趨勢，與審視學術研討會的意義與價值。2012年5月23日至27日，於昆士蘭大學舉辦的「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國際學術會議中，讀書會小組就物質文化、性別研究、日常生活與文化史理論等主題的論著，進行專書報告，獲得與會者非常高的評價。
- ⁵ Aaron William Moore, *Writing War: Soldiers Record the Japanese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⁶ Tobie Meyer-Fong,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⁷ Danke Li, *Echoes of Chongqing: 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英文本收錄20位婦女的故事，中文本則編入35位婦女的戰爭經驗，於2013年發行。李丹柯，《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3）。
- ⁸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3).
- ⁹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Allen Lane, 2009).
- ¹⁰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¹¹ Troy Parfitt, *Why China Will Never Rule the World: Travels in the Two Chinas* (Saint John, NB: Western Hemisphere, 2011).
- ¹² 陳志讓曾指出軍閥是阻礙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一大因素：「……內戰、重稅、對新興事業的摧殘，又把中國現代化的工作延遲了三十年。」參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85-186。
- ¹³ 如董愛玲、宋懷芝等人關於韓復榘主魯期間山東省經濟建設的研究，儘管對韓氏在山東所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作了詳細的闡釋，卻並未提及韓氏支持並設立鄉村建設實驗區一事。參見董愛玲，〈試析韓復榘主魯時期的經濟發展及原因〉，《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1月，頁95-98；宋懷芝，〈韓復榘政府入魯初期的治魯計畫及實踐〉，《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增刊，頁70-74。
- ¹⁴ 如杜林、李先倫、李遠江等人的研究成果，儘管均論及韓復榘對鄉村建設的推動以及其與梁漱溟之間的互動，但仍缺乏系統性，在材料的彙集整理與敘事的條理性方面仍有改進的餘地。參見杜林，〈梁漱溟韓復榘的合作與衝突〉，《炎黃春秋》，2002年，第10期，頁66-69；李先倫，〈韓復榘支持梁漱溟鄉村建設原因探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頁128-131；李遠江，〈梁漱溟與山東縣政革新〉，《黨員幹部之友》，2010年，第1期，頁54-55。
- ¹⁵ 張守廣，《大變局——抗戰時期的後方企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19。

香港新界上水廖氏春祭考察報告

鄭澄
香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

梁浩宜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

蔡俊傑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2014年3月2日，我們一行三人於早上10時半到達上水廖萬石堂，進行我們的田野考察。廖萬石堂是上水廖族最大的祠堂，建於1751年。廖族原籍福建，其先祖廖仲傑於元代中葉南遷廣東。初居屯門，旋遷深圳河以北的福田村，最後才在上水雙魚河定居，而他的子孫其後散居附近一帶。¹廖氏春祭在每年的農曆二月初二早上11時正舉行。當日早上到達的時候，已看到不少村民在作祭祀的準備，而各式各樣的祭品也已鋪陳於桌上。

一、祭品及其象徵意義

據村民解釋，每款祭品皆有其來歷和涵意，在廖氏春祭整個儀式中有其特殊的象徵意義。除了常見的茶、酒、飯和湯之外，當日的祭品還有「五生五熟」、大燒豬、糖果等。「五生五熟」指豬肉、雞肉及其內臟，分開十碟而生熟各半。「五生五熟」所採用的生品和熟品也隨時代而有所改變或簡化。當日一位村民表示，以往的春祭會採用羊肉作為其中一種生肉，但不知何時被放棄作為祭品，由其他肉類取代。

不得不提的是，「五」這一數字具有重要的涵意。「五」字在中國農耕社會中有其象徵意義。在農業社會中，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是農民農耕方式的依據。只見當日村民用上了五塊被切成方塊模樣的豬肉象徵了土地，用豬肚拼湊而成的老鼠，象徵了五谷豐收，倉庫滿盈，吸引了老鼠到來。由此可見，春祭在廖氏族人的心目中有一個祈求祖先保佑族人在來年豐收的含義，同時也反映農業社會的生活。我們也看到在豬頭上放有一條長長的豬腸。按村民的解釋，豬腸代表「長長遠遠」的意思，希望廖氏家族繼續有長長遠遠的傳承。除了五種生品與熟品之外，從祭品

的數目也看到廖氏族人對「五」的重視與心思。只見每款祭品，皆整齊地放置了五件。此外，祭祀的大桌上也放上了兩三盤糖果甜點，例如有糖蓮子、甜桃等。村民表示，這是為了增添喜慶，與代表了「甜」意，希望大家能高高興興，甜甜蜜蜜。

二、祭祀儀式

1、拜左廳與簡公

在正式祭祖之前，族人先行拜祭左廳。左廳放置了對廖氏家族有貢獻的人物的牌位，例如曾作出捐獻的。村民表示，左廳不會有大型和隆重的儀式，只是上香表示心意。除了拜祭左廳，族人也會拜祭簡公，以表達對簡氏讓出土地的感激。相傳在廖氏到達上水之先，簡氏早已定居於此。簡氏後來慷慨讓出土地與廖氏，因此廖氏族人一直心懷感激。另外，在儀式舉行之前，負責祭祀過程的村民與主祭先行更衣與潔淨身體，在放上了柚子葉的水盤中仔細清洗雙手，表示對儀式的尊重。

2、點炮

儀式正式在早上11時開始。村民在祠堂門前點燃起炮竹和關上大門。²村民告訴我們，這是提示廖氏族人儀式已經開始，遲來者只能在門外等候，直至儀式完結。當日所見，只有村委與主祭可以站上主祭堂，其他村民最多只可站在中堂。大部份參加者都是年長的村民，很少年青的村民參與。需要一提的是，廖氏的女性族人只可在門外準備豬肉，待儀式完結時分派豬肉予村民。只有外來女性（即非族人）可以進入祠堂。不過，昔日不許女性進入祠堂觀看春祭的習俗已經廢除。在某程度上，可見到氏族在思想上的改變。

在當天，除了我們三人來自香港浸會大學之外，也可見到一些傳媒、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和市民前來參觀。

3、拜祭地脈龍神與五祖祖先

儀式正式開始。首先，族人先拜祭地脈龍神。由村長負責上香奠酒和稟告，有着告訴祖先、龍神儀式開始的意思，希望保佑儀式順利進行。在拜祭地脈龍神之後，族人再祭五祖祖先。雖然這個環節不是很大規模，時間也不太長，但拜祭五祖祖先是廖氏春祭中最重要的環節。當日見到其中一名村民爬到歷代祖先的牌位前，打開各個牌位的小門。村民告訴我們，這代表告訴祖先儀式已經開始，並邀請他們享用祭品的意思。村委以圍頭話誦讀祝文，所說的祝文也相當古雅。之後，村委和主祭再上香。主祭重覆以「一跪九叩」拜祭。為何不是「三跪九叩」？村民告訴我們，從前的確行「三跪九叩」之禮。後來，考慮到主祭都是最年長的村民，重覆「三跪九叩」的動作對於主祭來說實在吃力，於是簡化程序。當日所見，通贊和司祝³拿着一本小書，內容就是儀式的程序和祝文的內容。村民也向我們透露：從前是不用小書的，村委要把內容記熟背誦。後來，村民也覺得儀式過於複雜難記，其後用上了小書幫助儀式的進行。由此，我們可見到儀式隨着時代而改變和簡化。在主祭祭過歷代五祖祖先之後，其他族人的子孫按輩份高低進行奠酒，完成拜祭五祖祖先的環節。

4、拜右廳、福德正神與領豬肉

拜祭五祖祖先之後，族人再拜祭右廳，即魁賢祠。魁賢祠放置有功名的廖氏族人的牌位。拜祭過程並不繁複，只由村長負責上香拜祭。過往，本來由主祭負責，因考慮到其身體負荷，於是改由村長負責。拜過右廳之後，族人再拜土地，即福德正神，祈求土地護佑。之後，整個廖氏春祭儀式正式完結，過程約為45分鐘。相比過往需要3小時，現在的儀式實在簡化了不少。最後，族人到門外排隊領取豬肉。愈年長分得的豬肉愈多，而只有61歲或以上的村民和去年出身的

男丁才可以領取豬肉。

三、廖氏春祭的社會學意涵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曾經提出「集體表徵」的說法，認為人們共同參與宗教儀式，能夠建立身份認同，促成群體的團結精神。這種集體情緒實際上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在集會中，參與者分享共同的興奮、憤怒或憐憫，使個人產生一種強而有力的共鳴，驅使個人融入集體成為社群的一部份。涂爾幹指出，部族成員能夠團結在一起，是因為施行宗教儀式時使集體變得亢奮，從而形成具有凝聚力的道德社群，因此宗教儀式有凝聚社群的功能。涂爾幹指出：「崇拜的真正功能是喚起崇拜者某種心靈狀態，具有道德的力量與信心。」⁴那麼，廖氏春祭有相同的宗教功能嗎？根據前廖氏村長所言，近年來有不少廖氏族人遷居到市區，在外工作，甚至移居海外。族人變得很少聚在一起。但是，因為每年的春祭及秋祭的儀式，使到不少族人專程回來，參與廖氏祠堂的祭祀儀式。廖氏海外兄弟回流，鄉親父老聚首一堂。通過不同程度的參與宗教儀式，廖氏族人確認共同擁有的歷史，分享同一感情，以及於共同的信念下認同其宗族的身份，並形成具凝聚力的道德社群。上水廖氏的春祭祭祀儀式似乎能體現涂爾幹的「集體表徵」的理論。

另一方面，集體追悼也具有團結個體，促進社群的道德整合的作用。在上水廖氏的春祭儀式中，追悼是一種集體責任與義務。面對先人的祭祀，社會群體更需要一起集會，以產生新的團結能量。彼此通過追念先人，分享共同道德理念及價值觀，從而強化廖氏宗族的團結性。簡言之，對於涂爾幹而言，社群的維繫在於它是一個道德共同體，而上水廖氏正是通過分享慎終追遠的精神而形成一個道德社群。

然而，從春祭的儀式中，我們也可看到涂爾幹理論的局限。首先，上水廖氏是香港新界的宗族，屬於父系社會，具有濃厚傳統中國社會的父權文化。在春祭儀式中，只有男性才可以參與祭祀，也只有男性才能站於祭壇之內主持禮儀。反之，女性大多只是擔當協助及後勤的角色，如於

廚房預備祭祀的食物及協助分配豬肉。因應性別的差異，宗教儀式把社群成員區分為權力核心和邊緣份子。這反映女性在儀式中分享集體表徵或身份認同是有其局限的。

此外，廖氏春祭的身份認同也存在時代的局限。在過去，上水廖氏的經濟模式以農業為主，所以祭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經歷時代的變遷，以往的農業社會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年輕一輩要外出工作，無暇參與祭祀。根據我們與廖氏「長老」的訪談，現今廖氏的祭祀往往只限於年長的一輩，而外出工作的年輕一輩往往難以參與春祭。可見，廖氏春祭與現代化社會活動互相排斥，阻礙年輕一輩的族人通過春祭分享當中的集體感情和建構身份認同。

最後，階層的局限也令宗族的身份認同產生障礙。如前所述，上水廖氏宗族具有濃厚的傳統中國文化意識，重視長幼有序，而形成長幼有別的層級。於春祭儀式中，負責祭祠的長老也主要由族內的長輩及長子所組成。相對而言，庶子並不能夠直接負責祭祀。他們只能於儀式最後奠酒。最年長的長輩也就是祭祀的核心人物，反映廖氏春祭具有階層性。不同層級的族人，可能只會分享不同程度的身份認同。

四、總結

廖氏春祭對於建構共同的身份認同雖有其局

限，但儀式的道德整合作用其實就在於集體聚會。對於涂爾幹而言，聚會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現象，能夠產生形成社群的元素。畢竟，在現今的世俗生活中，集體意識處於消耗的階段。族群成員投入個別的工作領域，私人的關切是主要的焦點。但是通過廖氏春祭，族人的群體生活獲得了再生的機會。儀式聚會必須要週期性的舉行，以成為制度化的生活規律，才能抵抗日常生活對於群體意識的消耗，故此廖氏春祭需每年舉行。這些活動的意義在於透過共同的參與，強化成員之間的道德凝聚力，塑造集體的認同。因此，廖氏春祭是一種儀式性的聚會。

註釋

- ¹ 參古物古蹟辦事處，《廖萬石堂》，<http://www.amo.gov.hk/form/Liu%20Man%20Shek%20Tong%20pamphlet2011-01.pdf>。
- ² 關上所有門的原意是防止妖邪入侵。參見香港記憶網站，<http://www.hkmemory.org/hkfestival/lcsw/index.html>。
- ³ 通贊，即代表唱禮的人；而司祝即代表朗讀祝文的人。參見香港記憶網站，<http://www.hkmemory.org/hkfestival/lcsw/index.html>。
- ⁴ 涂爾幹著，芮傅明等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431。

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合辦

第二十七屆歷史人類學研究生討班

日期：2014年3月22日-3月23日

地點：中山大學歷史系（永芳堂）

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

一、8:30-10:00

主題演講：太湖流域社會史調查的日本傳統：以民間信仰為例
主講人：佐藤仁史（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教授）

二、10:20-11:50

主持兼評論：陳海立（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李靈玢（湖北大學歷史文化院）
題目：洞商與羊樓區域社會研究

三、12:50-14:20

主持兼評論：段平（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報告人：喬東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題目：宋元之際呂氏家族研究

四、14:20-15:50

主持兼評論：陳貴明（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王惠（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題目：紅色僑鄉：廣東潮州地方的家族、移民與革命

五、16:00-17:30

主持兼評論：劉曉聰（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張龍騰（香港科技大學人類系）
題目：印尼歸僑的跨國記憶：以福建常山華僑農場和香港的印尼歸為個案

2014年3月23日（星期日）

六、8:00-9:30

主持兼評論：黃文保（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陳耀宇（青海師範大學人文院）
題目：遼代于越職官研究

七、9:45-11:15

主持兼評論：洪國強（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劉艷偉（西華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題目：清代四川鄉試研究

八、11:15-12:45

主持兼評論：黃旭珍（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鮑俊林（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題目：江蘇海岸帶歷史地理研究：以明清兩淮鹽作活動為中心

九、13:30-15:00

主持兼評論：李義瓊（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趙劉洋（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題目：乾隆「大一統」觀念與其對準噶爾策凌議定邊境事之反應：兼論濮德培「中國西征」說

十、15:15-16:45

主持兼評論：李婧怡（香港科技大學人文部）

報告人：黎俊忻（中山大學歷史系）

題目：晚清民國時期的武術、政治、社團與民族主義：以精武體育會及國術館的活動為中心
(1907-1937)

十一、16:45-17:45

圓桌討論

主持人：郭廣輝（中山大學歷史系）

引言人：所有報告人

《歷史人類學學刊》

徵稿啟事

(本學刊收錄為「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1. 《歷史人類學學刊》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2. 本刊發表具有人類學視角的歷史研究和注重歷史深度的人類學研究論文。
3. 本刊為半年刊，定期在每年四月及十月在香港出版。
4. 本刊實行匿名評審制，所有發表之論文均須經兩名或以上評審人審閱通過。
5. 本刊發表論文稿件一般不超過三萬字。書評稿件不超過三千字。
6. 來稿請注明中、英文篇名、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院校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並附中、英文摘要各約300字及中、英文關鍵詞各3至5個。
7. 來稿以打印稿為準，同時敬希作者盡量通過電子郵件提供文本格式之電腦文件。
8.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採用刊登，論文作者將獲贈該期學刊五本，書評作者則獲贈兩本。
9.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10. 作者投稿前，請自留底稿。投稿後一般會在兩個月內接到有關稿件處理的通知。為免郵誤，作者在發出稿件兩個月後如未接獲通知，請向編輯部查詢。
11. 本刊編輯部設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繫方法如下：

郵政地址：中國 廣東省
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歷史人類學學刊》編輯部
郵政編碼：510275
電 郵：hshac@mail.sysu.edu.cn
電 話：86-20-84114831
傳 真：86-20-84112122

活動消息

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Vines of Kinship, Fields of Lavende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Island of Hvar, Croatia



Professor Bojka Milicic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Date: 8 April 2014 (Tuesday)

Time: 10:30 am - 12:00 noon

Venue: RM 7332 (Lift 13-15)

Academic Building, HKUST

Language: English

Enquires:

Tel: 2358 7778

E-mail: schina@ust.hk

Web-site: schina.ust.hk

Organizers: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HK-SYSU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活動消息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再論明代向上社會流動



徐泓教授
廈門大學歷史系

日期：2014年4月14日（星期一）

時間：10:30 AM - 12:00 NOON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
陳冠貞論壇（LTH）

講者簡介

現任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終身講座教授、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中國明代研究會常務監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員及中華奉元學會理事長。

曾任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藝術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香港科技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部創設學部部長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署理院長，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創系主任、教務長及代理校長，明代研究會理事長。

已發表明清鹽業、明清社會風氣、明代婚姻與家庭及國內大移民、明代城市、清代台灣自然災害及明清史學相關論著八十餘種、學術評論三十餘篇及歷史普及讀物三十餘篇。

查詢

電話：2358 7778

電郵：schina@ust.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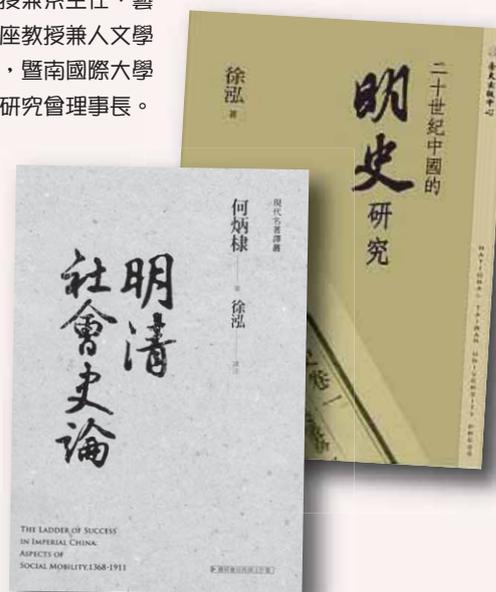
網頁：schina.ust.hk

合辦機構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活動消息

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Distributive Structures:

Fashioning Communicative Orders Across the East Asian Austronesian Divide

Speaker

Professor Frederick H. Dam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Date Time Venue

16 May 2014 (Friday)
10:30 am - 12:00 noon
RM 2042, IAS Building, HKU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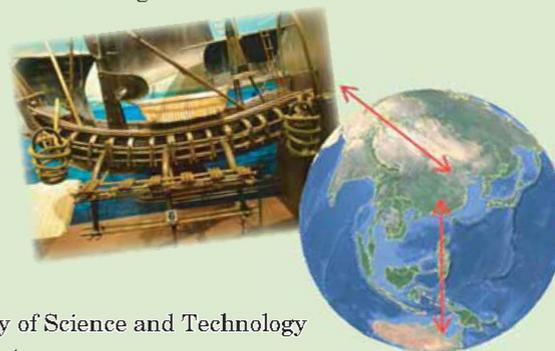
Abstract

This presentation reports on an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orders construct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cultures that came to inhabit the South Pacific over the last 6,000 years. The analysis center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ignificant ocean-going vessels in across this region.

Enquiries

Phone
E-mail
Web-site

2358 7778
schina@ust.hk
schina.ust.hk



Organizers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HK-SYSU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 : _____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